

大讲堂

梁冬的庄子世界

近日,著名主持人、中国文化传播者梁冬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做题为《梁冬的庄子世界》的讲座。梁冬曾任凤凰卫视主持人和百度副总裁,目前正在主持旅游卫视的《国学堂》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冬吴相对论》两档节目。当晚,在北师大新图书馆报告厅,梁冬和北师大师生分享了他所理解的庄子思想。

庄子的思想为什么伟大

话题由一个梁冬曾经做过的实验展开,实验的过程是让任何人随口说出成语,然后对这些成语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蕴涵有故事的成语当中,有接近一半的成语出自《庄子》。这就意味着,庄子对国人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随后,梁冬将庄子与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这三位对人类意识形态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进行了比较。他指出,释迦牟尼事实上没有摆脱其皇家血统,是依靠皇族的支撑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孔子则是由其学生及著作来推广思想,而且儒家学说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老子则是继承了其家族作为掌管国家文化资料官员的职位,成为了全面掌握上古文化的少数人之一。与这三位思想家相比,庄子则是既没有皇族背景、权利背景,也无弟子和家族背景的“草根”,凭一己之力,通过融会贯通很多发生在身边的简单故事,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循循善诱的笔法,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这一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强大的“思想病毒”——具有强大的生长力、植入性和扩展性——不依赖权贵、历史、学生、组织体系、社团,在没有强大的互联网媒介的古代社会,能够传播开来,延续下来,并对世世代代的国人产生影响,足以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庄子》的内在逻辑

在说明了庄子思想的伟大之处之后,梁冬开始就他所理解的庄子和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庄子》内七篇,外二十二篇,其中有很多故事。那么,这些故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又是如何通过这一内在逻辑组织的呢?

梁冬首先介绍了中国的两套知识体系,一个是儒家学说,孔子、孟子、张载、朱熹,他们一脉相承的潜台词是:我们都是相联系的,一体的,是讲“仁义”、“大爱”的;与之相对,老庄则更强调差别,更注重研究和表述“大多不能连接”的情况。

老子说“大象无形”,用以说明人的视野和感知都是有限的。内心则有,内心无则无。梁冬把庄子和“意识频谱”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频率,所以老庄认为人性和人之间的共振和沟通是很难形成的。

一切沟通来自于共振,比如收音机是通过一定的频率来接收信号的。人性和人之间,有了真正的认同感和共振之后,才能真正进入彼此。人生总有一些偶然,不是靠知识,不是靠语言,而只是频率上的共振。但老庄认为两个人形成共振是稀有情况,只是偶然才有的交集。这才是事情的本来,爱是偶然,沟通是偶然,成功是偶然。所以说,庄子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不相信一切完美和必然,由此而形成了不强求的哲学。

如何得逍遥

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有怨恨恼怒烦等各种情绪。“怨”,其实就是“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也就是说,所有的抱怨来自于不理解。梁冬以民众抱怨政府、员工抱怨老板及父亲和儿子少有换位思考来举例子说明,这些都是因为形成不了共振,绝大部分人的内心,只是偶有共振。其实《逍遥游》就是在说“不要指望人性和人之间能够达到完全的共振,充分的联接,不要指望你和我之间是一样的”。这里梁冬通过一个浅显的例子加以解释:男女之间性别不同,自我认同不同,生理结构不同,成长经历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所以完全理解是不可能达成的。如果能真正理解这个道理,也就不存在抱怨了,就会转而寻求自身的不足,承认自身的局限性,继而,要做的就不再是抱怨,而是试图理解更多的层面和意识频率。

梁冬紧接着又对“烦”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对不确定东西的焦虑”产生了“烦”。那么如果真的相信人生是基于一种大的趋势的话,就不会烦了。我们的人生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因为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一个人的命运包含了天地人的因素:天,出生在什么时代;地,出生在什么地点,这决定了饮食、生活习惯等;人,你的父母。这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难以控制和改变的。我们能控制的,只有如孟母三迁这类事情(改变地点),也就是说人为可以改变的只有约 15%到 20%,而且需要强大的意识知道要改,需要改,才能完成。只能对可以改变的东西进行改变,并努力去做了;意识到有很多不能改变的东西,就可以安天命,这样就没有“烦”了。

以上“怨”和“烦”的例子说明,正是因为很多不良情绪——“怨”无法互相理解,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想法和自己一样;“恨”是希望别人不好,“恼”是希望别人好但别人没做到,“怒”是自己以为存在的一个“自我”受到了否定;“烦”是对不确定的东西的焦虑,认为自己的频率是无限宽的,没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怨恨恼怒烦时刻相伴,使得做人无法逍遥。

梁冬说,《逍遥游》就是让你意识到:第一,每一个人的频率都只被分配了很窄的一段;第二,不要企图自己和别人的频率时刻相同,所以就不会对别人有那么多的要求;第三,一个人要变成一个伟大的人,就应该不断扩展自己的心量和频率,起码,应该承认在自己所看到的事情之外,还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随后,梁冬展开说,也许很多引起负面情绪的事情,都有其合理的地方,或者有不了解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看到的都是有局限的,只看到一部分的光亮。很多东西是基于自己已知的判断,因为未知也许更多,因为立场的不同,所以这个判断很可能不正确。

最后,梁冬总结道:要得逍遥,第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对方;第二,能够拓宽自己的意识频率,能够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地考虑问题,就不会落在某个角度里面,才能真正得到逍遥。庄子逍遥的境界,是从一个宽频的意识光谱中看到的。有了这种心态,人生就有了无所不在的力量,任何人和事都无法伤害你。有诸于内,必显于外,归根结底,一切的成就,都来自于内在的修炼,让自己建立全息的、开阔的频谱,达成之后就会发现天下之事无非一个念头,心念一闪,就会震动四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内在修行中完成。

(高冉 / 整理)



梁冬

毕业率·就业率·教育质量

□林新宏



努力通过提高教学质量来提高就业率,是高校的必然选择,也应该是当前高校在处理教育教学质量与就业率之间关系的主流。

教育教学质量与就业率之间关系的主流。

毫无疑问,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高校不是职业培训机构,不是技能训练场所,不应该把目光完全盯在学生的就业率上。但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重要的民生,是学生的切身利益所在,事关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社会进步和经济科技的发展,无论学校和政府,都不可能不高度关注。显然,让政府部门和高校“停止统计和追求就业率”,是不现实的,当然也是行不通的。面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政府和高校无论如何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就业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要求政府和高校“停止统计和追求就业率”,无异于因噎废食。

就业率与教育质量的情况如此,高校学生的毕业率与教育质量的关系又当如何?

从 2006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全国高校本科四年的毕业率为 36.1%(六年的毕业率为 57.5%),而我国高校本科生的毕业率大都在 97%以上。不可否认,美国高校宽进严出的政策,有利于保证毕业生的质量,也使他们保持着较低的毕业率。但是,这里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不能反因为果,也不能反果为因。而且美国高校毕业率低的原因,并非如此单一。美国本科生的在校学习,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他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也可以以种种原因休学一段时间甚至服一两年兵役后再回校读书,所以美国的本科生才存在四年、五年、六年甚至更长年限毕业的情况,这些也是美国高校学生毕业率低的原因。美国大学之所以能保持这种状态,有制度的原因,体制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而所有这些,必然也必须有强大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管理体制作保证。中国则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当今中国中等规模的大学每年大概都有三五千人毕业,如果将毕业率降至 70%——即使如此,与美国也还有巨大的差距——每年应该毕业而未毕业滞留学校的

大学档案

百年暨大激荡史

1931 年 8 月至 1932 年 2 月受中共党组织委派,江上青在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习。虽在校时间不长,但他坚持学习理论,追求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以饱满热情创作了一批爱国诗篇,与暨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本人也逐步锤炼成坚定的革命战士,并为革命英勇捐躯。

在暨南的学习

1929 年 7 月,江上青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在校期间入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和一批左翼作家交往。1929 年 12 月不幸被捕,1930 年 12 月获释。

一年的牢狱生活,使江上青受到极大摧残,患上严重的哮喘病。而上海艺术大学,因为频繁的学生运动在 1930 年 5 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被迫停办。江上青只得先回老家养病。

1931 年 8 月,江上青身体稍有好转后,先后两次向党组织请求工作任务。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他到上海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继续从事秘密的“学运”工作。

人读暨南时,江上青是一位刚满 20 岁的青年才俊,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年华。他不顾身体虚弱,孜孜不倦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世界革命简史》等书籍。江上青先后听了邓初民、李达等人讲授的社会学等课程,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为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暨南的学运

江上青入读暨南大学,是中国社会命运多舛的时期,这段时期,上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作为著名的国立大学,暨南学生当然不会袖手旁观。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1931 年

百年暨南,三落三起,五度播迁,与国家的命运共起伏,以精卫填海之坚毅意志,培养了五大洲学子 20 余万人。江上青无疑是灿若星辰的暨南校友中最为闪耀者之一。

江上青与暨南大学的不解之缘

□卢健民

9 月 21 日,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召开国难紧急大会,相继成立抗日救国会。9 月 25 日,大夏大学抗日救国会全体学生上街宣传,揭露日军侵占东北的罪行。暨南大学等 24 所大夏 51 名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向蒋介石严正提出“驱除日军出境”、“武装学生”、“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等 5 项要求。与此同时,9 月 23 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党员利用各种团体或学校的名义,公开活动,组织罢工、怠工、示威游行和集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对日宣战。1932 年 1 月 28 日晚上,暨南礼堂正在上演田汉新编的话剧《乱钟》,正当舞台上钟声、炮声响起一片的时候,暨南校园上空也响起隆隆的炮声,日寇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刹那间,暨南校园钟声大作,师生齐集操场,振臂高呼“保卫祖国,抵抗日寇!”江上青在校除学习外,还承担了继续从事秘密“学运”工作的任务,以上在暨南发生的学生运动,江上青积极参与其中。

在暨南的文学创作

江上青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激情的诗人,写下一些激扬诗篇,如《前进曲——东三省事件》、《旋风》、《握手》、《融化》等。九一八事变后,江上青义愤填膺,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前进曲——东三省事件》的长诗,诗中写道:

为什么我们底力量担心 / 悠长的午夜终要走向黎明 / 地球底边缘涌起了太阳 / 它奔来欢迎我们底渴望 / 有一天全世界受难的朋友 / 沐浴那温暖的阳光……

这首创作于在暨南就读时的诗作,和 1934 年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诸多抗日诗歌一样,在当时曾广为流传,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志的积极作用。

江上青因严重哮喘,在暨南撑持到 1932 年 2 月,只好再回到老家扬州,一

面养病,一面创办刊物,发表进步文章,鼓动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经历了在暨南的学习和锤炼,江上青逐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成为一名思想成熟的革命者。抗战爆发后,江上青组织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 年 11 月,中共安徽省工委委派他为中共特委书记,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成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最初的奠基人”(江上青战友、卫生部原副部长杨纯语)。

1939 年 8 月 29 日,江上青遇反动武装袭击,不幸遇难,年仅 28 岁。

暨南人情缘

江上青虽求学暨南时间不长,却与暨南人结下了不解情缘。与其相熟或神交的暨南人不在少数,试举三例。

一是葛任远。葛任远于 1929 年至 1932 年间在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就读。据江苏泗洪县烈士陵园内的江上青烈士事迹展记载,江上青在暨南读书期间,曾和葛任远一起从事地下党工作。1932 年 2 月,江上青因劳累过度,旧疾复发,离开暨南回到扬州。1934 年 8 月,江上青病体稍复,又受葛任远邀请,到江苏东海县民众教育馆做研究辅导工作。1935 年 7 月,因母亲不服东海水土,才无奈辞去东海民众教育馆职务携母回扬州。江上青在东海县历时近一年,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葛任远后因家计等原因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图书馆馆长,上世纪 70 年代末去世。

二是邓垦。邓垦是邓小平胞弟,原名邓先修,1911 年生于四川广安县,和江上青是同年人。1931 年春,邓垦同样受党组织安排,到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求学。邓垦 1931 年春入学,比江上青 1931 年 8 月入学早半年,尽管当时由于时局或其他原因,两人在校时间都不长,不过,社会历史学系为新设不久的系,学生不多,两人同时肩负着党



江上青

组织委派的任务,有着共同的学习和革命活动的经历。由于两人入学时间较为接近,有学者认为,两人应为同窗好友。

三是周一萍。周一萍原名周鸿慈,江苏无锡人,1935 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1939 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商学院会计系,1982 年曾担任国防科工委副政治委员。1936 年 11 月,江上青在江苏扬州发起创办《写作与阅读》杂志,该杂志是一份以中学语文教师和广大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的进步月刊,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后来,江上青又介绍其胞弟江树峰协助编务与发行。而周一萍 1936 年在党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暨南党支部组织的革命活动,为宣传抗日救国,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进步学生办刊物,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周一萍最先办了两个刊物《一般》和《译丛周报》。周一萍喜欢创作诗歌,和江上青的胞弟江树峰相熟,对这位富有文学才情的暨南学长江上青颇为神往,周一萍所创办的刊物深受《写作与阅读》的影响。